



“悬泉浮屠简”辨正



赵宠亮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摘要:郝树声、张德芳所著《悬泉汉简研究》公布的一枚所谓“悬泉浮屠简”,从内容和格式上来看,该简不是“僧徒之间的来往信件”,也不是“一件佛弟子要求拜见长老的名刺”,而应属于“请柬”性质的简。

关键词:悬泉汉简;请柬;名刺

Abstract Judging from the content and format, the ‘Buddha of Xuanquan Han wooden slip’, which is released on *A Study of Xuanquan Han wooden slips* written by Hao Shusheng and Zhang Defang, is neither a letter between monks, nor a visiting card of a Buddhist to pay a formal visit to an elder presbyter, but should be a invitation card.

Key words: Xuanquan Han wooden slips; invitation card; visiting card

新近出版的郝树声、张德芳两先生的《悬泉汉简研究》内公布了这样一枚有意思的木简,其释文为:

(1)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①。

关于简(1)据作者介绍,“简长 24.8、宽 1.6、厚 0.4 厘米,松木,基本完整,唯右下角四分之一处有残断,简号为 VI91DXF13C 30。”全简 24 字,前 11 字字体较大,后 13 字稍小。作者认为:“简中‘弟子’、‘浮屠’尤其是后者,有明显的佛教色彩。为叙述方便,暂称之为‘悬泉浮屠简’。”因为“汉简中发现佛教记载,仅见于此”,又“牵涉到佛教传入中国尤其是传入敦煌的时间问题,弥足珍贵”。作者首先对此简的年代做了考证,认为属于东汉时期的遗物。接着作者对于简文内容逐一进行了探讨。关于此简的性质,作者论述道:“通过简文词句和内容分析,这支简很可能是遗落在悬泉置的一封僧徒之间的来往信件,或者是一件佛门弟子要求拜见长老的名刺。不管何种文书,其中的佛教术语和佛教内容是十分清楚的。”

在文章最后“附注”里,作者提到了吴丽娱先生和胡平生先生对于简(1)的意见。吴丽娱先生认为:该简可能属于“请柬”之类的东西。对于简文的涵义亦有说明。而胡平生先生认为简文中的“西入”可能为“户人”,指谭堂的户籍身份。作者认为“吴、胡二先生的理解”“或更接近简文真实”。其实吴、胡二先生的意见是有很大差异的,应当不会均“或更接近简文真实”。

从所附简(1)的图版来看,作者的释文基本正确,只是“会月廿三日”有可能是“会月十三日”。张俊民先生文章引用该简时即写作“会月十三日”,这里我们遵从张俊民先生的意见。同时张俊民先生对该简也有说明,认为“我们似乎可以将本简理解为类似现在音乐会的‘邀请函’”。

兹先将改正后的简文,按照原简格式,逐录于下:

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

会月十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

下面我们对该简的性质阐述下自己的意见,并对该简涉及的问题略作探讨。

二

在仔细分析了该简释文和图版后,关于此简的性质,我们的看法与作者的观点不同,而倾向于吴丽娱先生的意见,认为简(1)应为一枚请帖。但是否即张俊民先生所说的“类似现在音乐会的‘邀请函’”则有待考虑。《悬泉汉简研究》的作者对于简文内容的探讨有很多问题,正是对于内容的理解有误而致使对简的性质认识出现偏差。现逐一提出我们的意见。

作者认为,“少酒薄乐”,“字面意思是劝诫别人或者要求自己,不饮酒,不耽于怡乐。”按:即便从“字面意思”,也看不出“少酒”为“不饮酒”;“薄乐”为“不耽于怡乐”。“少酒薄乐”的理解似乎应换一角度。在居延汉简中,以下简文与此类似:

(2) 伏地再拜拜请具酒少赐子建伏地再拜请具(10.25A)

伏地再拜伏地请具酒少酒少且具拜(10.25B)

(3) ☒ ☐ 孙次翁幸赐酒少少席_✓

☒ ☐ 受若欲复使_✓

_✓(228.22)

(4) 戎具少酒

谨请邑大夫官仄中功仄君都谢敖等三人同食五大夫幸临(EPT51·224A)

戎戎叩头幸甚幸甚第七三大夫第六三大夫第五三大夫第四三大夫

第三三大夫谨会月廿四日日中毋忽何君刑褚刑房(EPT51·224B)

简(2)似为习字简,但简文还是有可以发掘的历史信息。简中“具酒少酒少”与简(3)“酒少”、简(4)“具少酒”应均为谦词,义同后来的“略备薄酒”。与“少酒薄乐”一样,均即吴丽娱先生的意见,“为请人赴宴的一种客套话”。张俊民先生认为,“‘少酒’、‘薄乐’似可以理解为‘小酒’、‘小曲’。……‘少酒’、‘薄乐’应该是谭堂自己谦虚词而已”。按:“薄乐”似应理解为:宴席上有“一些音乐”,但不能径断为“小曲”。所以“少酒薄乐”应为“请人赴宴”的“客套话”、“谦虚词而已”。

关于“弟子”,作者认为,“当为自称和谦称”。按:仅从“弟子”称谓来看,是无法判断其与佛教的关系的。“弟子”称谓,如居延汉简:

(5) ☒ 弟子公士博士黑色年十八(62.19)

(6) ☒ 毋_□毋恙_✓

✓ 弟子伟子✓(乙附 22)

(7) 阜单衣毋鞍马不文史诘责骏对日前为县校弟子未尝为吏贫困毋以具阜单衣

冠鞍马谨案尉史给官曹治簿书府官繇使乘边候望为百姓潘币县不肯除(EPT59·58)

又如:

(8) 弟子遭迫疾谨遣吏奉谒再拜

问

君兄起居 卒史宪丘骄孺

(9) 弟子吴应再拜 问起居 南昌字子远(1016)

结合上述简文,联系史籍所记,“弟子”大约有“自称”、“谦称”、“弟之子”、中央、郡县学校学生、徒弟等多种含义。仅从“悬泉浮屠简”,不易判断其与佛教的关系。“弟子谭堂再拜请”,吴丽娱先生的意见是“主人请客的谦词”,张俊民先生认为,“显然是在说明写本文书人的身份与名字,又表明这个东西是给比谭堂高一等的人(只是没有敬称人名出现),可以理解为是谭堂的老师”。是否“这个东西是给比谭堂高一等的人”,是否“可以理解为是谭堂的老师”,都有待讨论。但结合简(2)“子建伏地再拜请”、简(4)“戎具少酒谨请”所记,其应为“主人请客的谦词”当大致不误,亦为当时致书请客的礼节用语。

关于“会月”,作者认为“有约定、限期、期会之意,也是汉简中常用语”。按:以上含义指的是“会”,而非“会月”。“会月”则指期会于当月某日,如:

(10) 十月壬寅甲渠鄯候喜告尉谓不侵候长赦等

写移书到趣作治已成言会月十五日诣言府如律令/士吏宣令史起(139.36,142.33)

如此,“会月十三日”当指期会的时间。对此,张俊民先生的意见与我们的基本相同。

至于“七门西入”,作者认为“文意不尽完整,不便强解”。按:此句确实“文意不尽完整”,因为它需与“小浮屠里”相接才能表达完整意思。“小浮屠里七门西入”表明期会的地点和门向。因为房舍在里中,在介绍具体位置时,就需要说明房屋的顺序和进入的方向(即大门的朝向)。如:

(11) 戌卒东郡聊成昌国里繇何齐 赏卖七
稷布三匹直千五十屋兰定里石平所舍在郭东道南
任者屋兰力田亲功 临木隧(EPT56·10)

(12) 赏卖□皂复袍县絮绪一领直若干千居延
某里王乙✓

戌卒魏郡贝丘某里王甲

居延某里王丙舍在某辟·它衣财(EPT56·113)

(13) ✓ 卖雒阜复袍县絮壮一领直若干千繇
得✓

✓ 东西南北入任者某县某里王丙舍在某里✓
(EPT56·208)

(14) 自有舍入里一门✓

居延西道里不更许宗年卅五长七尺二寸

居延同里□□✓(37.23)

简(11)为一赏卖记录,“兰定里石平所,舍在郭东道南”即表示房舍所在,简(12)(13)为赏卖文书的格式。简(14)“居延某里王丙,舍在某辟”和简(13)“某县某里王丙,舍在某里”亦表明房屋具体位置。而值得注意的是,简(13)中“东西南北入”,则表示进入房屋的方向(即大门的朝向)。简(14)则说明了房舍在里的顺序。类似简文,如:

(15) 终古卒东郡临邑高平里召胜字游翁 赏
卖九稷曲布三匹匹三百卅三凡直千繇得富里 张
公子所舍在里中二门东入任者同里徐广君(282.5)

(16) 惊虏隧卒东郡临邑吕里王广

卷上字次君 赏卖八稷布一匹直二百九十繇
得定安里随方子惠所舍在上中门第二里三门东入
任者阎少季薛少卿(287.13)

(17) 自有舍入里五门东入舍居延✓

✓ 包

能长君舍禄福广汉✓(340.33)

简(15)“舍在里中二门东入”、简(16)“舍在上中门第二里三门东入”和简(17)“入里五门东入”均表示房屋在里的顺序和大门朝向。其格式与“悬泉浮屠简”中的“小浮屠里七门西入”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小浮屠里七门西入”表明了期会的房舍及其朝向。很有可能谭堂的家舍即在“小浮屠里”,“小浮屠里七门西入”则为谭堂家舍在里中的位置和大门朝向。张俊民先生认为它“可以理解为谭堂与其老师约会的地点场所”;吴丽娱先生认为它是

“聚会地点和行走路线”。两者尽管有差异,但大意是一样的。

至于作者说该简“或者是一件佛门弟子要求拜见长老的名刺”的说法,因为由上所述自然不能成立。另外,从该简格式和内容上也不符合“名刺”的形式。有关“名刺”的讨论,可参见相关论著,这里不再赘述。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该简应为一枚“请柬”,而不是“一封僧徒之间的来往信件,或者是一件佛门弟子要求拜见长老的名刺”。所谓“其中的佛教术语和佛教内容是十分清楚的”的认识也需要修正。

三

此简之所以能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和重视,就是因为简中出现了“小浮屠里”的地名。它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传播路线、早期的传播状况等诸多重要问题均有关系,确实值得包括佛教史研究者在内的学者予以关注。

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有多种说法,学者们的认识也不一致。如汤用彤先生认为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为佛教始传的时间^①,许理和先生认为:佛教“渗入可能发生于公元前1世纪上半叶(中国势力在中亚巩固的时代)和公元1世纪中叶(佛教的存在首次在当时的中国资料中得到证实)之间”^②。李进新先生也说:“尽管诸说不一,但可以大致确定,纪元前后至1世纪……佛教已开始传入了中原汉地。”^③陈文英先生则说:“目前很难对佛教初传中国汉地的具体年代做出最后的结论”,所以,“就现有材料看,仍然以把佛教初传定为两汉之际较为合适”^④。佛教初传中国的具体时间确实不易遽定,此问题的深入尚需要新材料的发现。

简(1)中的“小浮屠里”佛教地名,其透露出的信息值得珍视,但却没有明确的年代信息。张德芳先生根据该简笔迹、伴出汉简的年代(51~108年)以及史籍所载西域的情况,认为其上限不能早于明帝,“时间当在东汉明帝(58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之内。中间经历了明、章、和三代”^⑤。张俊民先生亦据同出土层位的纪年简牍,“多为东汉中期”,认为:“此时出现的‘小浮屠里’与佛教东传的时间大体相当。”但据张德芳先生所列举伴出汉简年代大多数

为明帝、和帝时期,所以将此简定为东汉中期似应较妥。

简(1)也对于佛教入华的传播路线和在敦煌的传播状况,都提供了新的认识。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路线,学界亦有不同认识^⑥。该简虽然不能为陆路说提供最有利的证据,但对于陆路说毕竟是一份值得重视的资料。敦煌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站点,它是西域进入中原地区的第一站。在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地位,佛教最早由西域传入敦煌是有可能的。

该简所反映的信息,应当是佛教在敦煌当地已经有所发展的事实。“浮屠”或作“浮图”,有佛、佛塔等含义,季羨林先生认为它来源于大夏文的音译^⑦。简文中的“浮屠”应指佛塔,所以才有“小浮屠”的名称。佛教经过一定的传播,有了一定的信众,才可能修建佛塔,地方行政机构的“里”也才会采用“小浮屠”作为地名。这也显示了佛教在当地的影响。《高僧传》中的“佛陀里”记载,可以参见^⑧。但是否如张俊民先生所说,既然用“小浮屠”来命名里,“相对而言应该有一个‘大浮屠’才比较合理”。就目前资料来说,我们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敦煌以后的佛教发展,应是建立在东汉(甚至两汉之际)以来当地佛教传播和初步发展的基础上的。

附记:本文写作得到王子今先生的指导、孙闻博同学的帮助,谨致谢忱。

注释:

①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第186页,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

②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第186~191页,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

③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第194页,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

④ 张俊民:《悬泉汉简所见敬称和谦称》,《秦汉研究》(第四辑),第85页,三秦出版社,2010年。以下引张俊民先生的意见,均出此文,不再一一注明。

⑤ 本文所引居延汉简,凡简号为阿拉伯数字者,均出自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文物出版社,1987年;凡简号阿拉伯数字前为EPT、EPF等者,均出自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

四燧》,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⑥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第194页,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以下引吴丽娱先生的意见,均出此文,不再一一注明。

⑦ 连云港市博物馆、东海县博物馆、中国文物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研究中心编:《尹湾汉墓简牍》,第135~136页,中华书局,1997年。其中“遭”,疑应释为“遭”。同书又可见“弟子职”,第131页。

⑧ 李均明、何双全编:《散见简牍合辑》,第86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⑨ 关于此处的“门”具体所指学界有争论。何双全先生认为是指里门。见其《〈汉简·乡里志〉及其研究》,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汉简牍论文集》,第184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而张继海先生则认为:“简中的‘门’是否都指里门,也可怀疑……可以肯定的是,从汉简的记述来看,里中的建筑规划非常整齐,宅舍俨然,可能还有编号,可以准确地说出某人住在哪里。”见其《汉代城市社会》,第139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关于“东入”“南入”等,何双全先生认为“即家舍的具体位置”(《〈汉简·乡里志〉及其研究》,第184页)。而“家舍有东入、南入,而无西入、北入,可窥其每家的门口向东或向南”(第185页),而“无西入、北入”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⑩ 刘洪石:《“谒”、“刺”考述》,《文物》1996年第8期;扬之水:《从名刺到拜帖》,《收藏家》2006年第5期,等。

⑪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增订本),第47页,昆仑出版社,2006年。

⑫ (荷)许理和著,李四龙、裴勇等译:《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第2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⑬ 李进新:《丝绸之路宗教研究》,第6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⑭ 陈文英:《中国古代汉传佛教传播史论》,第39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

⑮ 郝树声、张德芳:《悬泉汉简研究》,第193页,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

⑯ 荣新江:《陆路还是海路?——佛教传入汉代中国的途径与流行区域研究述评》一文对各种说法的述评。载其《中国中古史研究十论》,第16~4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⑰ 季羨林:《再谈“浮屠”与“佛”》,《佛教十五题》,第102页,中华书局,2007年。

⑱ 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第16页,中华书局,1992年。

(责任编辑:周广明)